



戴好白色的一次性医用手套，杨慧撕开了一次性采血针头的包装，熟练地找到静脉血管的入针位置，轻轻进针，完成了采血的过程。11月30日上午记者来采访的时候，她正为一个小伙子采血，准备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2004年底，济南市首次接到了因为男男性接触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例，从事艾滋病防控的杨慧和同事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隐蔽的庞大群体，对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病干预工作迫在眉睫。为了和他们建立起良好的联系，杨慧和同事买上啤酒，准备好瓜子，一起走进了男同酒吧。

□文/本报记者 徐佳 □片/本报记者 徐廷春

▲11月30日，济南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副主任技师杨慧在检查抽取的血样。

# 没什么酒量的她提溜着啤酒花两年时间走遍济南男同酒吧

## 济南市疾控中心的杨慧已在抗艾一线坚守十年，她老公也是干这行的

### 1 进行信息登记时先清场 对检测者的隐私进行严格保护

昨天上午，记者前来采访的时候，杨慧正为一名小伙子采血，她的动作轻柔而熟练，接受采血的小伙子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这是一间约十平方米的小屋，桌面上摆了试管、一次性针头，后面墙上大大的红色丝带标志显示了它的独特身份。这是很多前来检测的人最不愿意踏进的一间小屋，但他们又必须迈出这一步。

完成采血之后，检测者的血液将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只需要一滴，滴到1厘米宽，10厘米长的一张试纸上，十几分钟之后就能知道大体的结果。“两条杠的是阳性，疑似感染，一条杠的为阴性，相对安全。”杨慧说，显示阳性的血样将被送到确

认实验室中，进行最终的判定。11月30日上午，这里来了几位自愿检测的人，在进行信息统计的时候，其余的人都被杨慧清出了房间，因为他们的隐私必须受到严格的保护。

这里是济南市疾控中心二楼最压抑的一个区域，在房间内的人心情忐忑，在房间外的人神色凝重，陪同前来的人在等待的时候不停地找地方躲避着路人的视线，但在小屋房门打开，同伴出来的一瞬间，他们又会迅速出现在门口。

杨慧负责的主要是男男性接触者的防治工作，“他们和别人没什么不一样，检测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杨慧这样告诉记者。

### 2 为了宣传艾滋病防控 她用2年时间走遍男同酒吧

现在很多男同会主动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但在8年前，他们还是一个需要被发掘和关注的群体。为了在男同中宣传艾滋病防治的知识，杨慧用2年时间跑遍了男同酒吧。

2004年，疾控中心来了济南市首位因男男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我们意识到，对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病干预工作迫在眉睫。”杨慧说。

作为一个隐蔽而庞大的群体，男男性接触者是艾滋病病毒感染高危人群之一。通过与首位男同开始寻找济南市男同的活动场所。

虽然酒量不行，天也很冷，但杨慧和同事还是买好啤酒，准备好瓜子，走进了酒

吧。“怎么也得和大家一起喝几杯”。为了摸清济南市男男性接触者的活动场所，2005年进入到2007年，以前从来没进过酒吧的杨慧基本将济南的男同酒吧走了个遍。

“白天坐公交车找，晚上去酒吧，经常碰一鼻子灰，因为一些酒吧的老板并不愿意接待。”杨慧说，进的第一个酒吧她到现在还记得，这个酒吧上面是拉拉(女同性恋)活动场所，下面是男同活动场所，“在男同区域出现一个女人是很奇怪的。”

通过两年的走访，杨慧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济南市男同活动的场所。在济南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的咨询室中有一张地图，上面用不同的符号标记出了男同的活动场所，并标记出每个场所的危险程度。

### 3 10年前每年只有几十名男同自愿检测 现在增至近千名

杨慧一定要带好几样东西：安全套、四本防艾小册子以及免费咨询检测的联系卡。

通过两年的努力，杨慧她们发动了一批志愿者，“我们现在不用再往酒吧跑了，主要依靠同伴教育员来进行动员和教育工作。”杨慧说。

而随着网络的发展，通过网络交友来寻找性伴侣也成了一种新的形式，在小院热线的网页中，工作人员也专门建立了男同板块，并链接了男同的QQ群，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在线进行艾滋病防治的交流，在杨慧工作的办公室中有一位专门同事负责接听热线，解答男同的咨询。

2002年的时候，一年只有几十位男男性接触者自愿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到2007年，每年到济南市疾控中心进行检测的男同已经达到了五六百人，现在已经达到了近千名。

而每年的四五月份则是集中检测的高峰时期，“2个月检测了400人，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对杨慧而言，不仅担负着检测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要安抚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疑似感染者的心情，“要告诉他们艾滋病是可以控制的。”

自愿检测是第一步，对很多感染艾滋病的男同来说，接受事实是一个困难的心理过程。

“对艾滋病感染者来说，心理波动最大的时期就是得知结果到接受结果的这段日子。”杨慧说，曾经有一位男男性接触者在疾控中心门口徘徊了十几分钟，最终才下定决心进行检测。

“他们的心情我最理解。”杨慧说，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在得知自己抗体呈阳性的时候，整个人瘫倒在了咨询室里，用头不停地撞击玻璃桌角，为了保护这位年轻人，杨慧赶紧找了块毛巾垫在手下，用手捂住桌角，直到男孩平静下来为止。

而得知结果后无处倾诉是不少男男性接触者遇到的相同困境。“我的手机号、座机号，他们都知道。”杨慧说，自己会把联系方式留给感染者，方便对方随时咨询。“我发烧了，会不会是发病了？”“我恶心、腹泻，有没有危险？”在接到这些电话或短信时，她都一一进行回复。

杨慧进行随访，给艾滋病患者打电话时，第一句话一定是“你现在说话方便吗？”如果对方同意，谈话才会继续下去。经过长时间的接触，不少人都把杨慧当成了知心的朋友，亲切地喊她“杨姐”。

### 4 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感染者 不少人亲切地喊她“杨姐”

2002年，杨慧进入济南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工作，成为济南市首批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十年间，当一起工作的同事们有的退休、有的转岗，只有她还一直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刚接触艾滋病防治工作时，杨慧以为接手了一个轻松的活儿，“以前病人比较少”，而十年之后，她说能体会到艾滋病防治工作“很难”，“从病人确诊到离世，都要全程跟踪干预”。

“2002年，我接触到一个13岁的艾滋病小患者，孩子的死对我触动很大。”杨慧说，这个孩子是因为六岁时一次意外感染上艾滋病的，“当时我们到医院去看

### 5 在抗艾一线坚守十年 见证艾滋病从无药可治到疾病可控

这个孩子，他因为免疫力低下感染了呼吸系统疾病，脸都憋得发紫。”见面之后孩子的妈妈就办理了出院手续，车子驶离医院不久，孩子就死在了妈妈的怀里。

“那个时候艾滋病真的是无药可治的，2004年开始可以通过服药很好地控制病情。”杨慧说，曾有一位中年男性患者通过服用药物控制了病情，3个月内长了30斤，精神好多了，而济南首位男男性接触感染者通过药物治疗，现在生活得也很好，还成为了社会工作者中的主力志愿者。

“我就希望以后能发明出可治愈艾滋病的药物。”说起对以后工作的期待，杨慧告诉记者。

### 6 丈夫也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 这在全国也不多见

对于杨慧的工作，她的丈夫非常支持，因为他也是一位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技术人员。两口子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在全国也不多见。

“我丈夫在实验室，他的工作更危险。”杨慧说，经过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之后，呈阳性的血清都要进行进一步的确认，“经过实验室



▲济南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为“世界艾滋病日”准备宣传品。

Table with 2 columns: Stock Code and Stock Name. Contains a list of various stock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values.